

对应用史学和历史资源研究、 开发、应用问题的思考

向志学

古老的史学正面临新的挑战。在新时期,历史科学应如何发展,这不仅是史学界,而且是整个社会都在焦切思虑的问题。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震撼着世界和人类。社会改革的潮流、商品竞争的漩涡和科学整体化的趋势正在席卷全球。自从人类打开了新技术革命的潘多拉魔盒^①以来,世界几乎失去了控制。人类创造的巨大物质力量,使得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史学的功能和价值正在被各个学科所肢解、所分割。面对科学界纵横捭阖、屈伸分合的现实,有人认为不必留恋往昔“经史子集”四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②;有人甚至无可奈何地发出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感叹^③。这些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定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④的观点水火不相容。而且科学整体化的趋势,也要求历史科学固有的综合性学科的因素,发挥应有的作用,使之重新活跃起来。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我们应该走出文献之塔,开放史学之宫,向现实生活的最深层最广域进军,架起通向四个现代化的桥梁,这才是历史科学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

应该提出应用史学这一概念

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科学是震撼社会的神奇的大杠杆。科学的威信是一种理智的威信,它的论断都是按实验的方式、实践的途径得出来的。近代科学首先通过伽里略和雷奥纳改良大炮和筑城术而见称于世。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的重要性还在不断增长。当然我们决不应该贬损基础理论的意义。有时,基础理论的某一项突破甚至可以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但是,归根结底它还会深深作用于现实。所以,决不应该轻视科学的应用。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质上更是革命的科学、实践的科学。马克思早在《费尔巴哈论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因此,从科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都应该着重提出应用史学的概念。

另外,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应用是科学发展的目的,又是科学发展的起点,它在认识模式的两个层次上促进认识的飞跃。此外,中国古老的史学传统也一再表明:从孔夫子、司马迁、司马光到梁启超,都是主张“垂训”、“褒贬”、“通变”、“资治”的,要“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在中国,兰克式的“纯客观”的治史思想是基本没有市场的,至少是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学派。中国古老史学的经世传统也可引为当代史学发展的殷鉴。马克思主义一直把历史科学看成是“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⑥。这些都说明,我们完

全有可能把历史科学，象自然科学的某些学科一样，划分成基础和应用两大部类，来协调学科内部的关系，增强学科的社会功能。

把史学区分为基础和应用，最深刻的内因还在于学科内部框架结构的合理布局上，在于学科建设的长远战略思考上。为了适应新时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历史科学必须建立一种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能在理论上深究又能在实践上应用，形成一种横的多向面、纵的多层次的网络状的学科有机机制，这将会给史学的繁荣带来无限生机。要知道，区别史学的基础和应用是在深触史学灵魂，是在解决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这既将有利于理论思辨的纵深开掘，又会促进实践应用的前沿突破，从而使整个学科赢得战略和战术的全面胜利。

为了给历史科学注入生机，当前特别需要加强应用史学的建设。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建立使颠倒的历史被重新颠倒过来。辩证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很多空白研究领域得到了填补。但同时，也应看到：极左思潮、阶级斗争为纲、影射史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有的人一直热衷于贴标签、搞定性；历史教科书往往被写成双重的三段论——背景、经过、意义，阶级矛盾、人民起义、让步政策；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的分期讨论了几十年，仍然莫衷一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狭窄陈旧的现状不能继续，教条主义的作法必须休止。而打破旧框框、医治老教条最效验的灵丹妙药，莫过于加强学科的实践性和群众性。也就是说，既要改革基础史学的研究，又要建立深入实践、联系群众的应用史学。

强烈的社会实践性是应用史学最鲜明的品格

我们所要建立的应用史学应该是历史科学联系现代生活的纽带，是历史科学通向社会实践的桥梁，是历史科学实现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中介。基础史学或者说理论史学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过去，复现真实的历史，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预见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应用史学的主要任务则是指导未来，把基础史学的成果和历史资源中一切有现代价值的因素加以筛选、提炼、加工、制作，用应用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再处理，形成一种新成果，然后再输送到社会实践中去，使其在创造人类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开拓这样一个分支学科，历史科学才能说是深深地钻进现代社会生活的广阔的土壤，才能生发到五彩缤纷的现实的大千世界。这样，古老的历史科学才能根深叶茂，万世长青。

应用史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必然具有整个学科的共性，但强烈的社会实践性才是它最鲜明的品格。它直言不讳地声言为应用、为变革世界的实践服务，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需要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特征，它应该站在现代和未来人类需要的高峰，来回首人类的过去。它必须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敏锐的洞察未来的意识流。应用史学工作者应该是一群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拓荒者和淘金者，应该既是现代和未来生活的严峻解剖家，又是古代生活深邃的洞察人，而不是老态龙钟的古董鉴赏家和点缀升平的学究。必须明确：“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⑦如果不能深深根植于现代生活的土壤，是根本无法从事这项研究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⑧党的这一伟大号召，无疑

应该成为应用史学研究的战略制高点。

应用史学为了实现自己最本质的特征——强烈的社会实践性，必须立足于现实，善于在浩瀚的历史资源中进行提要和钩玄。凡能为我所用者，都应“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它不能连篇累牍、苦涩艰深地去系统复述真实的过去，也不着重繁琐考证、审慎甄别那些歧义多端的各种史料。应用史学的着眼点和功力圈，全在于应用，全在于抓住真金、精选美玉，把历史上能为我用的精华，真实、简洁而又迅速地奉献给我们的时代。

应用史学为了实现自己最本质的特征——强烈的社会实践性，还必须把握住现代生活最敏感的经济脉搏，向自己的学科反复灌输价值意识、商品观念，要和科学技术挂钩，要和新兴学科交叉，力争使自己的成果打入技术市场，进入专利网络，参加咨询活动。这样，史之为用，也就不是原始的、贵族式的“资治”之用，只为少数帝王将相提供治乱兴亡之道、长治久安之策，而是一种现代的、人民大众的“资世”之用，即为国家领导和普通公民提供各式各样具有历史色彩的产品，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这样，历史科学才能冲出抱残守阙、食古不化的牢笼，才能积累起学科发展的雄厚资金和变革现实的经济实力，才能在当代生存竞争之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应用史学为了实现自己最本质的特征——强烈的社会实践性，还必须强化“咀嚼”、“消化”和“加工”、“制作”的功能。也就是说，要提高批判继承的本领和变革现实的能力。必须看到：历史资源是人类历史冲刷所形成，它和其它资源一样，只能存在于原始形态之中。沙土掩埋着金粒，蚌壳包裹着珍珠。但是，历史的精华毕竟又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存在，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拿来、现成的搬用。因而，研制应用史学成果的立场和方法、审美心理、编纂技巧以至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历史工程学都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否则，应用史学成果的迅速介入现代社会，仍将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但是，这种加工、制作和处理，和影射史学的歪曲历史，则是水火不相容的。

最后，强烈的社会实践性要求处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年代的应用史学，必须具有迅速灵敏的反应能力——外向反应能力、内向反应能力。“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些企业格言在应用学科中也应该有它的位置。如果每一学科都等待藏之名山，束之金匮，动辄就讨论30多年而莫衷一是，那应用将更待何时呢？所以，应用史学应该乐于充当历史科学活跃的前沿阵地和灵敏的末梢神经；应该迅速输送成果，及时传递反馈，使学科的认识水平得到升华、升华、再升华。

我国应率先成立历史资源研究、开发、应用中心

应用史学作为一门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一种学科建设的强烈实践感。与其坐而论道，何不奋起而实行。我国学术界和史学界早在50年代末就提出过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口号，可是时至今日，史学的应用仍然得不到重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多年来存在一种通病——即知行脱节、理论与实践分离。两者之间缺少一个权威的中介，没有具体法制、行政和经济措施的保证，于是很多正确的设想都成了纸上空文和时代泡影。鉴于我国历史资源和史学传统的特殊优势，又鉴于建立应用史学的需要，我觉得很有必要向整个社会呼吁：我国应率先成立历史资源研究、开发、应用中心(公司)，为应用史学的实践开辟一条现实而又广阔的道路。

必须看到，我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世界文明古国。历史文物之众，历史典籍之多，历史传

统之厚，在世界各国中是独占鳌头、无与伦比的。不仅美、苏、日、欧洲各国望尘莫及，就连古老的埃及、希腊和罗马，也只能是望我项背，自叹不如。特别值得庆幸的是：“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唯史学。”^⑥从殷周就开始了史事记录，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文献和史学著作出现最早且种类、数量最多的国家。仅从《四库全书》大大压缩了的数字来看，当时已有各种古籍173052卷。这还未包括由于政治原因销毁的近7万部。至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200年间，出版问世的文献那就更是汗牛充栋。这当中有不少稀世的秘本、珍本、孤本和手抄本。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古代天文、地理、术数、医药、科学艺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意识……各方面的信息。这是美、苏、欧、日根本无法比拟的。

不仅如此，我国的历史文物资源更是琼楼玉宇，画栋雕梁，珠宝流丹。我国经久不衰、连绵不断的历史发展进程，都有丰富的地上和地下文物可资见证。我国的文物发掘，硕果累累，成就惊人。建国37年来发现了百处以上的旧石器遗址，7千多处新石器遗址。帝王行宫墓葬也有突破性发现。现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243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100多个。全国初略统计各种可移动的文物达800多万件，不可移动的文物史迹达10万处之多。这些都是祖宗遗留的珍宝，先人血汗的结晶，灿烂文明的物证，是其它国家无与伦比的。此外，我国有长期多民族聚居的传统，使我国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还保有一些古代村民部落，这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活化石”，我们可以从中采撷到无限丰富的历史资源。

总之，上述种种，都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特殊优势。我们完全应该而且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成立历史资源研究、开发、应用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我们的“中心”应该是一种新型机构。它全面负责国家历史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发和应用，是一个以应用史学为核心、多种学科密集的科研攻关单位。同时，它又是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企业部门。因此，它实际是一种行政教育、科研出版和生产经营熔为一炉的新型联合体。它从战略高度出发，对我国古老的历史资源、灿烂的古代文明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发掘，寻找传统之根，探索文明之源，把历史的英魂传输给现代，又把现代的光华传照给远古。因而，它实质上是中国古老文明自我检讨、自我反思、自我复兴、升华再造、辐射传播的大熔炉。

建立这样一个“中心”，主要着眼于历史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发和应用。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历史资源这一概念。我使用这一概念，而不使用人文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等概念，是因为历史资源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来看，都比上述各种概念更为全面和周密，更为准确和科学。而且，它又是一种约定俗成、顺理成章，便于大家理解和掌握的概念。另外，历史资源正好和自然资源成对应词。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是大自然发展演变的结果。而历史资源则是人类历史发展途中，经过我们祖先的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的各种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的成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又是指人类史，所以我们应该称这些成果和结晶为历史资源。

这种资源如果是一种物化的存在形式，它当然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价值。它们的价值，大体上是可以根据以下几个客观标准估算出来的：首先当然是估算它制作时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次是看它的稀有程度、古老程度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率。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以物化形式存在的历史资源，简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奇世界。至于精神型的历史资源和精神、物质之间的中介型历史资源，我国也有丰富的宝藏，正等待着应用史学家去识别、提炼和摄拾。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历史资源不仅和自然资源、矿产资源一样，具有一种先天的不

可再生性，而且还十分珍贵和罕见，甚至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稀有性。因而，它不能象自然资源、矿产资源那样，进行开采、熔铸，当做原料利用。它们的应用价值，有时甚至比自然资源还难于进行一次性测准。因而，在未能测准之前，首先必须全面、精心地加以保护，要进行历史资源的全面立法。当前社会安定、国家中兴，应该对历史资源进行全面清点、收录、分类，利用电脑、遥控、录象、录声、缩微、检索等现代科技手段做出条分缕析、分门别类的编码，储存到高级电脑中，形成检索终端，为世界和人类、为国家和民族研究和应用历史资源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一项泽被生民的经国大业，也是一项万世流芳的文化壮举。我们这代人完全应该着手从事这件大事。

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可以考虑把分散在各个科研机构、大学、文博、档案、图书、旅游和古建筑、古文物、古典手工业企业中的人、财、物集中起来，形成强有力的中心。我们首先应该对物质型的历史资源给予特殊的关注，这是和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商品生产激烈竞争和文化发展的经济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钱学森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中曾深刻地指出，要把“中国过去那些封建统治阶级享受的东西”，“变成人民共同享受的东西”。他感慨万千地说：“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没有钱，没有物质基础不行。”^⑩建立“中心”也必须要丰富的物质基础。

古罗马文明的摇篮——意大利，1985年实施了一种远见卓识的“文化经济”新战略，把文化遗产看成战略资源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这很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历史遗存的旅游价值是开始被人们关注了，但潜力远远未能挖尽。其实，不仅是从旅游角度，而且应该从国民经济发展、从维护人类文化遗产、发展对外贸易和世界文化交流的战略高度来深思这一问题。

必须看到，早在马可波罗年代、路易十四时期，中国的物质文明就曾征服过欧洲。法王路易十四修建中国式的瓷器官殿，曾引起整个贵族社会的轰动。如今，中国广东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又被聘到了巴黎。据说1987年在巴黎附近又将出现一座古典风貌的中国城^⑪。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北美，“中国皇后号”的处女航也曾引起过美国国父华盛顿的倾倒，他亲自购买过300多件巧夺天工的中国瓷器，作为纪念。1796年，凡·勃拉姆修建“中国静修所”；1832年，内森·邓恩修建“中国小别墅”、“中国展览馆”。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文明在美国形成的“凝固音乐”，曾引起过美国公众的倾倒和膜拜^⑫。这些也都表明我国古老的物质文明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强大生命力。有人争论什么三大国粹、四大国粹，我看远远不止这些。我国古典宫殿、园林、陶瓷、丝绸、中医、烹调、戏曲、书画、针绣，甚至雕塑、服饰、盆景、摆设、器皿都是以傲欧美而冠寰宇的。我们制订新的对内、对外文化经济战略，必须把它们当做自己的基石。马克思早就指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并把它们看成是历史的“世俗基础”^⑬。我们强调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正好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近年来，洛阳“九都”牌正字唐三彩和甘肃武威文庙的铜奔马在国内外市边上畅销^⑭，都表明历史文物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复制和生产具有无限美好的远景。如果通过“中心”改变分散落后的经营方式，尽快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使之形成多档次、多规格、成龙配套的拳头产品，再向国内外市场投放，是会取得增收创汇的良好效益的。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落实了讲求效益的文化经济战略，才能把历史的物的资源的研究和开发真正放在最基础的部位，来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才能使“昔日宫廷珍奇物，进入寻常百姓家”，才能使史学的古为今用真正落脚在“世俗”的基点之上，冲破狭窄的“资治通鉴”的藩篱。

写到这里，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美国的斯坦福。显赫的硅谷，特曼的试验，成为现代史上一种成功的正反馈效应。教育科研和生产经营，互得“近水楼台”之月，共为“向阳花木”

之春，这确实是科学昌盛、企业繁荣的康庄大道。斯坦福的优势是高技术、电子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在这些方面暂时还处在劣势地位，而且很难立即转劣为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何尝不可以尝试一下凭借我国的历史资源优势，建立起以历史资源为核心的我国的斯坦福模式。我想这样一种尝试或许是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当然，应用史学更应该重视精神型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中心”在具备一定物质基础，形成一定经济实力的同时，必须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比物质现象更为高级、更为复杂的运动形式。我国历史为我们遗留了层累的积淀、深厚的遗藏。我们对此必须有一种批判的眼光，分析的态度。与此同时，也必须有一种尊重历史的诚心，继承遗产的渴望。如果动辄就是骂倒一切，前无古人，象极“左”路线统治时期那样，把历史看成是一片混沌和黑暗，那还有什么应用史学可谈呢？

“中心”对涉及决策的软科学应该关注。开放和引进必须与历史国情的研究和承受能力的分析同步进行。应用史学的研究必须走在决策的前头，不能总是跟在后面做注释、搞诠释。除了全局性决策，部分的、局部的、一省、一市、一地、一县，甚至村镇、集体、家庭、个人的大小决策，应用史学都可以大显身手。一种群众性的历史咨询所也是可以尝试建立的。象葛洲坝水库，从坝址选择到水文资料的测定，都凝聚了史学工作者的心血，这种做法显然应该大力提倡。

事实上，应用史学可以为很多学科提供历史资源，也可以径直把这些资源制作成新的成果。例如，应用哲学史学家就可以把艰深古奥的历代哲学精华，加工制作成普及读物，使之成为当代思想道德或智慧的启示录。文艺领域，我国古老的历史文艺素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先人留下过典范式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运用各种先进的文艺手段（如录象、录音、电视、广播等）再搞出多种历史连台戏，长、短篇历史小说，史剧、史诗、史舞、史乐以至历史故事、历史杂文来丰富现代和未来的文艺大舞台，来占领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吗？这些边缘地带，文学家和史学家是完全可以交叉融汇、互相协作的。

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哲学方面，应用史学也大有文章可做。当代的所有学科几乎都在进行着追根寻源的探索。但是，这种单科性的分析性的研究，绝对代替不了整体化的历史反思。当前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学的蔓延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而“中心”的成立，更能从应用的高度推动这一研究的发展，并使之从学者的书斋进入百姓的弄堂。从长远来看，“中心”完全应该成为科学整体化发展趋势的总枢纽，但这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总之，应用史学的提出和“中心”的成立，是否可以标志着历史科学革命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进一步加强，也预示着历史科学的重新崛起和更加繁荣昌盛。它实质上是我国人民在新时期崛起腾飞的伟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古老文明自我检讨、自我反思、自我复兴、升华再造的一条必由之路。它的影响和意义将会超出学科范围和国界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硝烟弥漫的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创建历史科学的。他们没有也来不及在夺取政权之后，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进行缜密而又精深的历史回顾，因而也就没有而且不可能对历史科学应用问题作出圆满的回答。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历史科学面临新的开拓。本文提出的一系列设想，就是基于这种情况而考虑的，希望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注释：

① 希腊神话故事，宙斯神命令粘土制成的人类第一个女性——潘多拉带一个盒子下凡，她私自开了

盒，于是各种祸害都跑了出来，散步到世界各地。

② 丁伟志：《“察古而知今”是历史学的价值》，载1986年1月22日《光明日报》。

③ 张国刚：《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载1986年3月19日《光明日报》。

④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页。

⑥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页。

⑧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

⑨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水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

⑩ 1986年1月13日《光明日报》。

⑪ 《中国市容报》1986年合订本。

⑫ 齐文颖：《关于“中国皇后号”来华问题》，丁·高尔德斯坦：《1682至1846年费城对华贸易》，第75—76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⑭ 见《中国青年报》1986年摄影图片，1986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上接第123页）

从战略、经济、科学角度来看，它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它与所有主权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继续特殊地对待南极洲问题，不准以任何方式取得对其领土主权的法律依据，仍然是充分有力的，在目前形势下，对这种特殊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南极条约》虽然就南极洲的法律地位、考察和利用等问题作出了某些规定，有一定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对该大陆伸张领土主权的少数国家间的妥协性文件，不是由全体联合国成员国共同谈判缔结的完善的条约，至今也才只有28个成员国。对于南极洲目前的法律地位，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它的某些不完善、不明确的条款以及为少数国家保留领土要求的规定等，已不能适应历史的发展和普遍的要求，并且该条约将于1991年期满，有必要订立新的国际条约。

南极洲问题是一个与全世界的国家都有利益关系的国际性重大问题，仅由《南极条约》的缔约国来决定其地位和前途，是不适当的。因此，联合国有必要召开专门会议，让全体会员国来讨论、决定南极洲的命运和前途。联合国可以在现有《南极条约》的基础上，参照关于外层空间及一切天体问题的国际宣言和公约，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国际海底“区域”的有关规定，制订关于南极的法律地位、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环境保护和解决争端的国际公约。应在新的公约中明确宣布：整个南极洲及其资源，在现阶段均为全人类的财富，任何国家都不得要求对南极的领土主权，不得通过使用、占领或任何其他手段，将其任何部分据为己有；应该明文否定某些国家过去或现在对该地区所主张的领土主权，而不是仅仅冻结和保留这种领土要求；重申专为和平目的而开放使用南极洲，严格禁止一切军事性措施。为上述目的，联合国应该设立南极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国际管理机构，负责统一计划、安排、开发和利益分配等有关事项，让一切国家，不论其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如何，均有权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自由考察、利用和开发南极洲，公平地分享其资源所带来的惠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对开发该地区有所贡献的国家，应该给予特别的照顾。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南极洲问题较为合理的解决，才可能确立南极洲目前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之法律地位。